

产教深度融合 赋能商科创新

——基于温州商学院课程改革的深度观察

□ 谭 巍 黄伟宇 万晓洁

在新文科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双重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如何真正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温州商学院管理学院以《绩效管理》课程为突破口,开展了一场以“产教深度融合”为核心的教学改革实践。这项改革深刻植根于温州独特的民营经济土壤,通过系统性重构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探索出了一条立足地方产业特色、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应用型商科人才培养新路径,为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两张皮”的困境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温州经验”。

立足区域产业 重构课程体系

课程改革的逻辑起点,在于对温州区域经济生态的深刻洞察与精准回应。温州作为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其阀门、鞋服、泵阀等产业集群特征鲜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充满活力,但在管理现代化转型中面临共性挑战。课程团队在前期调研中发现,一家拥有130余名员工、年产值近1.2亿元的典型中小型阀门制造企业,正在从家族式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过程中,对构建科学、实用且契合地域文化的绩效管理体系需求极为迫切。

基于此,课程团队果断摒弃了“学科导向”的传统路径,采用“反向设计”理念,将产业真实需求作为课程内容重构的核心依据。在保留绩效管理基础理论系统性的同时,课程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构,来自温州本土企业的真实案例占比显著提升。例如,在讲解绩效指标体系时,教学重点从通用的KPI、平衡计分卡(BSC)理论,转向探讨如何为温

州中小企业设计兼具战略牵引性和文化适应性的个性化指标。这种“场景化”的课程设计,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区域产业升级的“真需求”无缝对接,从源头上确保了人才培养的精准性和实用性。

深化校企协同 创新教学模式

产教融合的深度,取决于校企协同的机制创新。该课程最突出的突破在于构建了“双师型”教学团队与“真实项目驱动”相结合的教学实施新范式。课程团队突破了高校师资的单一结构,邀请温州智鹏阀门集团有限公司等合作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深度参与教学全过程。企业导师不再是偶尔开设讲座的“客座嘉宾”,而是成为课程设计的共建者、项目指导的协作者和学业评价的参与者。

这种深度协同带来了教学方法的深刻变革。课程全面推行“课堂公司制”模拟实践与真实项目驱动教学模式。学生以小组形式组建模拟公司,直接承接来自合作企业的真实课题。在最近一轮教学中,一个学生小组为当地一家鞋服企业设计的“销售团队创新积分制”方案,因其巧妙结合了短期业绩激励与长期创新导向,被企业采纳并进入试点阶段。这种沉浸式的学习体验,使学生得以在近乎真实的管理情境中锤炼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而企业也在从中获得了新的管理思路,实现了校企双方的互利共赢。

强化思政引领 厚植育人底色

高水平的产教融合,必然是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该课程在推进教学改革的同时,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探索出

了一条“润物细无声”的课程思政有效路径。课程团队将绩效管理理论与职业道德、诚信精神、社会责任、家国情怀等核心价值观自然融合。

在教学方法上,课程团队探索出“案例引导+价值探讨”的有效模式。例如,在讲解绩效考核的公平性原则时,结合温州本地企业在抗击疫情、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真实案例,引导学生深入探讨企业追求经济效益与担当社会责任的平衡之道。通过邀请具有代表性的温商企业家走进课堂,分享其“敢为人先、守信重义”的创业经历与管理智慧,将区域特色文化基因和创新创业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育人全过程。这种基于真实情境和价值反思的教学,使思政教育不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与专业学习相伴相生的内在感悟与价值认同,有效提升了立德树人的成效。

完善多元评价 提升培养质效

为确保产教融合的改革成效可衡量、可持续,课程对传统的评价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建立了以能力为导向、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多元化形成性评价机制。改革的核心是显著降低期末闭卷考试的权重,从传统的70%降至40%,取而代之的是突出实践能力与过程表现的多元评价。

新的评价体系实现了“三个多元化”。一是评价主体多元化,创新性地引入企业导师评价,并将其权重提升至总评分的30%,结合教师评价、小组互评与学生自评,构成了多视角、立体化的评价网络。二是评价内容多元化,重点考核学生在企业真实项目中的方案设计能力、调研分析深度、团队协作与创新思维,而不仅仅是对理论知识的记忆。三

程体系时还应采用个性化的选课办法,结合行业细分岗位的特点,设置运营管理、技术开发、跨境电商三个主要方向,让学生按照自身的职业规划选择侧重模块。这种兼顾基础、实战和前沿,又给予学生自主选择权的课程重构方案,既能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结合起来,又能对准行业不同岗位的人才需求,让课程体系变得更加灵活、更具针对性。

其二,强化实践赋能。学生职业实践水平的提升离不开校企的深度联合与资源互补。学校要主动联系头部电商公司以及优质的中小电商单位,建立长期稳固的协同育人基地,消除“浅层合作、形式化参与”的问题,邀请深耕行业多年的企业骨干深度参与课程设计与实训指导。学生可进入公司体验店铺运营助理、直播场控、供应链专员等真实工作,参与从选品、上架直到售后复盘的整个项目环节。与此同时,学校中的实训设备需同步更新换代,给学生搭建低成本、高仿真的实训实践平台,如建立模拟电商运营中心、申请主流电商平台的实训号以及专业数据分析软件的使用权等,准确还原“618”“双11”大促时的压力高峰、流量突然下滑、对手冲击等真实经营场景。另外,学校也需采用以赛促学的模式,精准对接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三创”赛等高水平比赛,让学生在激烈的竞争中积累实战经验,补足自己的能力短板。

其三,完善协同机制。学校作为培养

是评价过程多元化,通过建立学生学习档案,持续记录并反馈其在项目实践中的成长轨迹。评价体系的“指挥棒”效应,成功引导学生将学习重心从书本知识向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迁移。跟踪数据显示,参与改革实践的学生在毕业半年后的就业对口率与起薪水平均显著高于往届,合作企业对实习生实践能力的满意度大幅提升,印证了新评价体系的有效性。

温州商学院《绩效管理》课程的改革实践表明,深化产教融合必须进行系统性的机制创新,其核心是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在目标、内容、过程与评价上的全方位对接。这项改革的价值不仅在于一门课程的成功改造,更在于它为应用型高校如何服务地方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即必须扎根区域产业生态,建立可持续的校企协同机制,并将产教融合的理念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展望未来,产教融合应从“课程突破”走向“体系重构”。高校应积极探索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共研行业标准等更深层次的制度性融合,将产教融合内化为办学治校的基本模式。同时,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如何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融入教学,进一步提升产教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也将是重要的探索方向。温州商学院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让教育改革的步伐与产业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才能培养出真正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的智慧和力量。

【谭巍系温州商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乡学院副院长;黄伟宇系温州商学院管理学院讲师;万晓洁系温州商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

人才的关键主体,要主动打破校企以及校社之间的隔阂,牵头成立协同育人理事会,通过明确各方权责边界与利益共享机制,推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与成果共转化的深度融合。企业应当适当增加在人才培养上的投入,完善“岗前+在岗”全周期培训体系,依靠老员工带新人的办法帮助学生尽早脱离校园稚气、跟上工作节奏。更关键的是,建立起常态化的需求反馈渠道,将一线岗位的技术要求、行业发展的变动及时传给合作院校,给课程改进和教学变动提供实在的实践参考。社会上的培训机构则要根据自己在细分领域的长处将培养链条里的空缺补齐,主动配合学校的课程安排来精细调整培训内容,避免重复教学与技能断层等问题,聚焦高校理论教学与企业实战需求之间的差距精准发力。

总之,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深入,电子商务领域对人才的要求已经从简单的“技能匹配”变为“价值创造”。这种需求的变化是行业由规模增长向高质量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促使人才供给方必须摆脱旧有的培养模式,准确对齐岗位需求和行业难点。未来,电商人才的培养应当将行业要求当成基准点,不断更新培养逻辑和内容,筑牢“技术+商业+素养”的电商人才培育根基,从而为数字经济与电商行业的长久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

(作者系武汉工商学院讲师)

弥合数字鸿沟 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 杨兴慧

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快速普及与迭代,显著提升了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的便捷度与运行效率。然而,不同群体在数字资源获取、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使得部分人群难以有效参与数字经济活动,无法平等享有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红利,进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形成明显制约。

数字鸿沟的基本内涵

“数字鸿沟”这一概念最早在1989年由英国《时代教育专刊》正式提出,美国学者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著作中,将其阐释为信息技术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差距。在此研究基础上,学者Attewell把数字差距划分为两大维度:一是能否顺利接入计

算机网络;二是使用者对信息技术的实际运用水平。国内学者韦路则在此之上进一步拓展,提出数字鸿沟还存在第三个层面,即个体在信息渠道获取与知识吸收方面存在的差异。

数字鸿沟的形成机理

经济条件是形成数字鸿沟的根本原因。区域与群体之间在经济发展层面存在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在生活条件、资源分配等方面出现明显区别。

政策制度同样是加剧数字鸿沟的重要推手。不同地区在互联网建设、信息服务推广等方面采取的政策与支持力度存在差别,进一步拉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差距。

个人受教育情况、经济收入、性别与年龄等特征,同样会影响其信息技术操作与

应用能力,进而在不同个体之间形成数字使用上的差距。

数字鸿沟的破解路径

首先,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层面可针对经济欠发达区域,对其第三产业推行本地化精准减税政策,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投入力度,将这种财政支持打造为一套独立的社会帮扶模式。

其次,加强政策性基础设施建设。应加快推进乡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加大适合农村居民使用的低成本智能设备研发与普及力度。通过持续扩大宽带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夯实数字服务的硬件支撑。为确保社会公众能够平等享有通信服务,政府部门应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引导和支持普惠性宽带接入方式的创新与推广。

最后,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是推动社会

治理实现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一建设思路的核心,是通过多元化、场景化的数字素养培育活动,帮助社会成员主动运用新一代数字技术提升生活品质,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具体可建立面向青少年的阶梯式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将相关内容系统纳入基础教育阶段;针对在岗劳动者开展与职业需求相匹配的数字化技能培训,为老年群体设计适配其使用习惯的学习内容。同时,把数字技能培养融入日常生活,在城乡社区搭建数字学习体验场所,在农村地区建设专门的数字技能实践平台。

总之,针对数字鸿沟问题,需要总结形成一套规范且体系化的应对方案,从而为增强基层治理的数字化普惠性、助力社会数字化均衡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向。

(作者单位:中共菏泽市委党校)

□ 冯宏伟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联村成片,抱团发展”的乡村片区式治理模式受到关注,是解决基层治理碎片化问题、激发基层治理内生活力的创新举措。基层党组织引领是乡村片区化治理的根本原则,更是片区化治理有序推进的核心支撑,能够推动乡村治理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明晰功能定位 强化引领作用

乡村片区化治理是指基于地理位置毗邻、产业发展相近、文化习俗相似的若干个行政村组合而成并进行资源融合、优势整合、共同发展的治理新模式。在这种新的治理模式中,基层党组织发挥着三大职能:

一是政治引领核心功能。基层党组织是乡村片区治理的政治核心,负责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乡村落地。其作用主要包括三项:一是方向引领,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优势,保证乡村治理不走偏路;二是思想引领,通过宣传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思想素质;三是组织引领,建立区一街一村三级协同机制,使党组织工作向片区治理延伸。沈阳市辽中区榆树底村实施“党建引领航·五治融合”,使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紧密结合,在全村形成“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庄”的治理局面,这种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的做法,是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核心功能的具体体现。

二是组织协调中枢功能。作为片区治理的协作中心,基层党组织主导成立片区联合党组织,统领辖区各村发展规划、产业布局与治理工作,统筹协调村级“两委”、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凝聚治理合力。沈阳市沈北新区建立以“村民说道会、评理说事会、四议一审两公开、街道人民调解室”为主体的社区分层协商体系,实现了多方资源的有效聚合,营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三是资源整合中心功能。基层党组织是统筹整合区域内外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资源。这一功能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政策资源整合,统筹各个部门的惠农政策落地,发挥政策叠加效应;二是经济资源整合,以“强村公司”“合作社”等方式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三是社会资源整合,联合社会组织、公司、乡贤等助力乡村治理;四是文化资源整合,深挖乡村文化底蕴,弘扬文明乡风。

创新实现路径 提升治理效能

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片区化治理需要从组织架构、运行机制、治理队伍、数字赋能四方面着手,协同发力,推动乡村振兴。

第一,优化组织架构,厘清职责边界。应当根据“地域相邻、产业相近”原则完善片区联合党组织建设,对产业关联紧密的片区成立产业链联合党委,确立片区联合党组织“统筹协调、规划引领、服务群众”的工作定位;同时,制定权责事项清单,厘清镇党委书记、村党组织书记等主体的责任分工界限,赋予统筹调配资源、项目、资金权限,避免出现“越位”“缺位”。例如,沈阳苏家屯区在打造“一核多元、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区域性党建联盟的基础上,在全区范围内形成“事事有人管、活动齐参与、服务大家享”的互联互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体系。

第二,创新运行机制,增强共建合力。完善片区党建联席会议机制,细化议定事项、决策程序,引入群众代表、乡贤、企业家参加讨论决策。进一步探索推广“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机制,实现项目资源的有效衔接,同时推行“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利益分配机制,保障片区内各村的发展权益,提高参与片区建设的积极性。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推动“强村公司”联建共建,街道党工委牵头完善片区党建联席会议机制,凝聚村企共识,邀请属地企业七星米业负责人、9个村屯的群众代表、党员代表、乡贤等参与“强村公司”运营,确定订单农业、稻田种养等核心合作项目,实现村集体资源与企业优势的精准衔接、高效联动,项目盈利后再按股权比例进行收益二次分红,保障各村参与片区产业共建的积极性。

第三,优化治理队伍,筑牢人才基石。落实片区干部“头雁工程”,围绕产业发展、数字化治理等方面进行专项培训,安排干部到发达地区参观学习;同时拓宽队伍选用渠道,在返乡创业者、退役军人中选出优秀人员,选派机关单位干部、技术人员到片区锻炼;还可实行党员“亮身份、设岗定责”制度,设立政策宣讲岗、产业发展岗等,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例如,沈阳市制定提升薪资报酬水平、畅通晋升途径等关怀举措,明确优秀社区工作者向事业单位、公务员的职业转换通道,自2022年起新招聘社区工作者累计近6000名,为乡村基层治理注入充足人才活力。

第四,加强数字赋能,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加快偏僻区域5G网络、互联网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集成优化“数字乡村”平台,实现网格管理、便民服务、三务公开等功能一体化,开通民生问题解决渠道;并对群众进行数字化教育培训,培养乡村数字化领军人物,实现数字化技术和区域治理、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例如,沈阳市沈北新区与中国移动合作,推进5G-A通感一体化基站建设,打造沈北低空经济区低空覆盖项目。沈北新区建成涵盖审批、流转、监管等11个功能模块的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宅基地数据库,实现区、街、村三级端口无缝对接。沈北新区建成区级数字城市运行指挥中心,打通指挥中心大屏端(决策指挥)、电脑端(业务办理)、手机端(移动处置)三端数据互通、业务协同联动。同时,依托网格化管理平台对全区智能化治理,“家在沈北”智能服务平台提供智能问答、网上办事等服务功能,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全程网办、不见面审批”。

乡村片区化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沈阳市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片区治理效能,使片区化治理成为助力沈阳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举措,为东北乃至全国类似地区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作者系中共沈阳市沈北新区委党校助教)